



中华文化与水

下卷

靳怀椿 著

长江出版社

K203/121

:2

2005



化与水

下卷

靳怀塔
著

作者简介

靳怀堵，天津市蓟县人，1963年10月出生。大学文化。先后任海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宣传信息中心主任、《海河志》总编辑、《海河水利》期刊主编、中国水利报社海河记者站站长等职，现任海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目录 CONTENTS

引言: 中华文化与水	1
治水与中华文明	13
治水与中华文明	15
中华运河文化	46
中华井文化	74
中华河湖海泉瀑雨雪文化	107
中华江河文化	109
中华湖泊文化	140
中华海洋文化	164
中华泉文化	184
中华瀑布文化	210
中华雨文化	223
中华雪文化	233
中华崇拜与水	247
中华水崇拜	249
中华龙文化与水	262
中华祈雨文化	285
中华岁时民俗与水	300
中华哲学、审美、环境观与水	309
中华哲学观与水	311
中华审美观与水	329
中华环境观与水	344
中华区域、象征、阴性文化与水	361
中华区域文化与水	363
中华象征文化与水	382
中华阴性文化与水	397
中国古代城市、交通、战争与水	407
中国古代城市与水	409
中国古代交通与水	431

中国古代战争与水	447
先秦诸子文化思想与水	463
孔子与水	465
孟子与水	471
荀子与水	478
老子与水	483
庄子与水	490
墨子与水	497
孙子与水	502
管子与水(上)	507
管子与水(下)	513
中国古代文学与水	519
神话传说与水	521
《诗经》与水	550
诗与水	562
词与水	583
古典爱情诗词与水	606
散文与水	614
赋与水	623
楹联与水	633
成语与水	646
中国古代艺术及体育与水	657
中国古代园林与水	659
中国古代音乐与水	670
中国古代绘画与水	681
中国古代书法与水	694
中国古代体育与水	698
中华山水、茶、酒文化与水	709
中华山水文化与水	711
中华茶文化与水	721
中华酒文化与水	739
参考文献	747
后记	751



中华区域文化与水

区域文化或称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是相当精确的地理单元，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渐淡化甚至泯灭了其地理学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加之人口迁移，只剩下大致的地理区域，并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厚重，博大精深。由于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古老的华夏文明并非起源于一时一地，而是通过各自的发展序列共同进入文明时代，最后汇集成统一的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双重作用，在神州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人是环境的产物。众所周知，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愈是如此。“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地理环境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生活在不同类型自然环境下人群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气质、观念等，都深深地打上地域的烙印。就中国而言，在降水较丰沛、湿润的东部地区发展起的农耕文化与降雨稀少、干燥的西部地区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差别甚大。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与处于四塞之地的三秦文化同样有较大的差异。至于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也各有其鲜明的特色。可以说，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因素和生产方式在内的生活环境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内在机制；特定的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人的心理素质、性格、行为，甚至风俗习惯、生活情态等均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生态环境决定文化形态，一定的生态类型与一定的文化形态相对应。

水是自然环境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对中华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正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

一

在自然和历史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中华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出丰富的多元

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形成，秦汉以后，又有较大的演进和发展。大体说来，主要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州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齐鲁文化，以山西为中心的三晋文化，以陕西为中心的三秦文化，以河北为中心的燕赵文化，以江浙为中心的吴越文化，以两湖为中心的荆楚文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巴蜀文化，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关东文化，以甘肃、宁夏为中心的陇右文化，以安徽为中心的两淮文化，以广东为中心的岭南文化，以福建为中心的八闽文化，以江西为中心的江西文化，以云南为中心的滇云文化，以贵州为中心的黔贵文化，以台湾为中心的台湾文化，以海南为中心的琼州文化，以广西为中心的八桂文化，以内蒙古为中心的草原文化，以新疆为中心的西域文化，以西藏、青海为中心的青藏文化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集合，构成了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给中华文化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也就是说，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离不开它所处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否则人类的历史活动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对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发生作用，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发生作用，对民族性格发生作用。事实上，地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两种主要因素，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结构。正所谓“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雄厚，有民族性”（黄宾虹《九十杂述》）。

一般而言，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大类。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等被称为自然地理环境，而疆域、政区、民族、人口、交通、农牧业等，又被称为人文地理环境。我们这里所称的地理环境，主要指自然地理环境。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其版图便“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

就自然环境而言，中华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自然区，横跨六个温度带，地理属性的差异十分明显。明人冯应京说：“中华地三分：一自汉蜀江南至海，二自汉江至平遥县（今山西太原南、汾阳东），三自平遥北至蕃界、北海也。南方大热，北方大寒，中央兼寒热。东西高下亦三别：一自汧源县至沙洲，二自开封县西至汧源，三自开封县东至沧海。东方大温，西方大凉，寒热不同，阴阳多少不一。”（《月令广义·方輿高下寒热界》，引《内经释》）这就将中华大地按纬度差造成的气温差，自南而北分成



三个气候带；又按“地高多寒，地卑多热”的地势造成的气温差，自西而东分成三个气候带。

在地球的各种水域中，海洋对气候的影响最大。中国基本上是一面向海的东亚大陆，境内水汽主要通过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输送；此外，印度洋为西南地区提供水汽，北冰洋为新疆地区提供少量水汽。对东亚大陆水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季风造成了东亚大陆降水量分布的趋势是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渐次递减——广东、海南、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的降水量高达2000毫米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西侧的托克逊年降水量则不到6毫米。而400毫米等降水线，从大兴安岭西坡，沿西辽河上游、燕山山脉，斜穿黄河河套，经黄河、长江上游，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以这条等降水线为界，其东南为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其西北为少受甚至不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干旱地区。这条400毫米等降水线，成为东南大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大体边界。

农业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门类。而植物的新陈代谢要求特定的日照、温度和水分。因此，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条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更是如此。中华文化的生发地，位于东亚大陆，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为主，北跨亚寒带，南入热带，就其日照及热量供应而言，绝大部分地段都适宜农业的发展，因而水的因素成为能否大规模经营农业的决定性条件。总之，降雨量的大体形势是东部充沛而西部稀少，这是东部为农耕区、西部为畜牧区的自然基础。中华文化的南北之别、东西之异，正是植根于这种与地理环境有密切依存关系的经济生活土壤之中。

二

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以劳动为介质。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形成各自文化类型奠定了物质基础。各种文化类型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比如，江河水系发达的暖温带—亚热带区域，可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充分的热能和水分，故那里的农业最早得到发展。相应地，因江河灌溉造成的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反过来又造成了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的文化特质。临近海洋的地区，拥有渔盐之利和交通之便，故工商业一般较为发达。相应地，因大海具有纵横驰骋、扬帆远航的条件，容易形成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草原—沙漠地区，具有流动畜牧的广阔空间，“射生饮血”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游牧文明具有粗犷剽悍、惯

于掠夺的性格（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中华先民很早就看到了水土气候对民俗文化的影响。《管子·水地》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不但是孕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即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该篇还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河流和水质情况与国民的体貌、性情、道德等对照起来，指出：“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而果敢。越之水浊重而自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汙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浑，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戇而好贞，轻疾而易。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具体论述了齐、楚、越、秦、晋、燕、宋各国水质的差异对当地百姓品貌习性产生的巨大影响。

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也认为水对人的气质、情操、心态等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水注之，水出西溪……斯地盖古冶官所在，故水权称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这段文字无非是说，澄明水质、清冷渊流可对士人闲适柔静的风度产生不小的影响。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云：“其山嵒巍以嵯峨，其水泝渌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他们都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方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品性简淡清洁，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往往具有磊落不凡的英气。

明人王士性在论及关中和川中水土与人性的关系时指出，关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稟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川中则土厚而水不深，乃出高原之义，人性之稟多与水推移”（《广志绎》卷三）。

与上述人物持相同或相近观点者多多。如：

《吕氏春秋》说，“轻水所多秃与癯人，重水所多鬲与颡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幸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佺与伧人”，认为水之轻、重、甘、辛、苦的不同，对人体的形貌和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认为川谷气象不同的地方，民俗也会有所差异。

《国语》说，“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认为人



自身的淫逸或勤劳与土地的肥沃或贫瘠关系密切。

唐人刘禹锡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送周鲁儒序》），认为水清则人慧。

许多古代地方志对水土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也多有记载。《浙江通志》说：“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邹县志》说：“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嗇”；《陵县志·序》说：“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径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地而不善悲歌；南近齐地而不善夸诈，民醇俗茂，惴惴无华”。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已充分感受到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对不同地域风俗文化的影响。

另据明人钱澄之所撰《记黄檗山居》载，当年吴地之人曾取笑他的家乡桐城一带园亭简陋，他听后不以为然地反诘道：“吾乡有真山水，何以假为？惟任真，故失诸陋，洵不若吴人之工于作伪耳。”山水奇秀之地，得天独厚，当然不必作伪藻饰了；而吴人因自然的缺陷，不得不巧于叠山理水之技了。由此观之，自然环境不但影响一地的风土人情，更影响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甚至民居建筑，它对某一地域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事实上，人们生活的环境因地理、气候的关系，造成了水的多寡和时空分布的不同；同时水对处于不同环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泽与灾难也是不同的，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必然造成在不同环境下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习俗和价值文化观念。我国古代逐渐形成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不同的区域文化，以及世界上出现的内陆农业文化、海洋文化、炎土文化等类型，都有力地说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对人们习性和文化类型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陷阱之中。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历史的变迁对地域文化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比如吴越文化，春秋之际，吴越两国连年征战，尚武习俗蔚然成风。史载，“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剑”（《汉书·地理志》）；“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左思《吴都赋》）。但晋“永嘉之乱”后，因北方士人的大批南迁，吴越民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明刘盘《成化记》），“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轼《表忠观碑记》）。把吴越民风从“尚武”转向“崇文”的原因归结为“永嘉之乱”造成文人大量迁往江南避祸，无疑是片面的，但其起到转变世风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对此，中国古代不少学者也有清醒的认

识，如明代的杨慎指出：“人有恒言曰：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也……人之性禀于天，自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地。习者则系乎君之令，师之教，而非水土所含也。”（《赶州乡试录·序》）这就强调了人的性情是水土与政令教化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并非由水土单独铸定。事实上，时代愈趋近代，随着人们的交往和流动日益扩大，地理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三

黄河是哺育中华文化的摇篮，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区域，是中华先民的主要聚居区，而且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并对其他各区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下面以中州、三秦、齐鲁、燕赵等区域文化为例，简述其文化特色，并简要探讨一下不同的水环境对这些区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中州文化。中州取义于位于华夏九州之中，主要指今河南的广大地区。古代中国，黄河中游最早曾用中国、中夏、中原等称谓为代称。由于华夏族多聚居于此，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少数民族而言，称此处为天下之中，蕴含着文明先进和民族优越的意义。中州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基石，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考古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中原地区分布的主要是仰韶文化。因它是1921年由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最早发现而得名。

中华文化植根的土壤是农业文明。河南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它在新石器时代就能创造与培植农业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远古时，河南一带的气候属湿润的大陆季风气候，具有北亚热带向暖温带气候过渡性特点，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河南属于典型的“河流文明”、“村落文明”。滚滚东来的黄河贯穿全境，另外还有淮、汉、海等水系诸河，共200多条河流自西向东流经河南。特别是黄河的定期泛滥，为中下游地区提供了肥沃的淤土，加之便利的灌溉，使中州地区农业耕作十分发达。发达的农业，推动了中原大地村落文化的发展。村落文化是人类由游牧狩猎生活走向定居生活时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原的村落以犁耕文化的出现为主要特征。考古表明，新石器时代，河南已成为中华先民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是黄河流域势力最强大的一种文化，广泛分布于中州大地的各处。其遗址中发现了大规模的村落，反映了人数众多的氏族集团长期在这里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这就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传华夏文明的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曾在中州大地上进行伟大的文明创造



活动。远古圣王尧、舜、禹更是主要活动于中原大地。大禹治水的足迹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商二代，统治范围主要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文字是文明象征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的时代。河南作为中原地区的中心，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它是中国汉字的发祥地。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而它的出土地则在河南安阳的殷墟。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殷商时期文字，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史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

中州自古帝王都。古代中州，不仅在中国最负盛名的七大古都中占有三座（安阳、洛阳、开封），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帝王之都最集中的地区。上古三代的都城多在今河南省沿黄河的两岸。《国语·周语上》说，“伊、洛竭而夏亡”，证明夏是一个以河南伊水、洛水流域为中心的王朝。商代有“汤至盘庚五迁”说，但所迁之都也在河南的黄河两岸。而盘庚迁殷（安阳小屯）至商纣王共 273 年“更不徙都”，说明商代在很长时间建都于安阳一带。西周建都于陕西长安一带，洛阳是其陪都；东周的王城则一直在洛阳。周代的封国都城，在中州就有几十处之多。自商至北宋的 300 余年间，全国性的都城多选在中州一带，主要原因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发达，而中原又是全国的中心区，统治者只要牢固掌握这片区域，就足以控制全国。

三秦文化。古三秦大地主要指陕西的陕南、陕北、关中三个区域，其地理位置处于渭河流域和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秦人的祖先原是流动于黄河下游地区的游牧部落，周时迁至西方的黄土高原。秦人立国的岐地，原为周人的故居，是中国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秦人学习周遗民先进的农耕技术，利用渭河流域水土资源优势，迅速地变落后的游牧经济为农业经济。春秋前期，秦人就已广泛地运用铁制工具，从而使农业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从精神文化方面看，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秦人津津乐道的是耕战、攻伐、垦荒、开塞、徕民、重本、抑末等事关国计民生之事，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远不如中原各国那样严格，“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要略》）。

与中州河南相似，“秦中自古帝王都”（杜甫《秋兴八首》）。三秦文化最富盛名的内容，莫过于关中地区以长安（今西安）为代表，这里曾是周、秦、汉、隋、唐等 11 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千百年来，陕西关中地区得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关中指西起宝鸡散关、东到潼关的渭河盆地——渭河两岸形成的广大冲击平原，也称八百里秦川。这里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实为一处地势险要的富饶之地。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也是决定一个地区自然资源是否丰富的基本

条件。而长安则有渭、泾、浚、灞、潏、涝、沣、镐八水环绕，有“被山带河”、“八水绕长安”之说。这八水既能灌溉长安周围的农田，又担负着城市供水和美化环境的任务。尤其是渭河，作为八水中的主干流，它横贯关中平原，默默地滋润着这块肥美的黄土地，并成该地区主要的漕运河道，为关中地区源源不断地运输着粮食等生活资料。

齐鲁文化。齐鲁地区，依泰山而濒大海，古称“岱海之区”。远在石器时代，“东夷人”就在这里创造了著名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是齐鲁文化的渊源。春秋时，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惟齐鲁之地，尤其是鲁国，“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并成为全国的思想文化的中心区域。一大批对中国文化有深刻影响的巨匠，如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子都诞生在这里。鲁文化作为原始儒学的产床，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以农为本，质朴务实，尊重传统，是原始儒学的特征，也是鲁文化的特征。相对而言，齐文化则显现出开放创新的风格。齐国开国之君吕尚的治国方略是“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对于周礼制度，既有依循，又有因地制宜的变通。历代齐国君王亦奉行吕尚制定的较为开放的国策，走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发展道路。

齐鲁文化的不同风格，与两地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齐地濒海，较之鲁国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地理环境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为了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齐国便利用其国“负海”的条件和夷人“通工商、便渔盐”的传统，实行“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经济政策，使工商业大兴，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总之，齐国具有重视工商业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齐文化追求功利的特色，使齐地的风俗中体现出淡薄礼教的精神，富有竞争性的商贾习气。鲁国没有濒海的渔盐之利，经济结构以农业为基石，执政者也以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相号召。

燕赵文化。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地区，即后来常说的燕赵地区。纵观燕赵地区的历史，大禹治水是其文化的重要开端，此后再到战国时期，最终奠定了它以“燕赵悲歌”为标志的稳定特征。从仰韶时代直到西汉，全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都在黄土高原和中原一带，燕赵区域虽然在旱作农耕方式和宗法血缘制度等方面都属华夏系统，但是和中心区域相比还是比较落后。只是到了战国时期，燕赵才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其经济都会燕、涿、沙丘、邯郸、中山与中原、齐鲁、吴越、荆楚、巴蜀等地的经济都会并驾齐驱。战国末期，秦国扫灭诸雄。六国中燕国是最后灭亡的一国，而荆轲刺秦王也成为六国的最后一次壮烈之举。“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年，壮士荆轲易水辞别，慷慨高歌，士皆垂泪涕泣。至秦，入宫见秦王，图穷匕



首见，未果被杀。燕昭王、太子丹的养士和荆轲刺秦王的壮举，标志着燕赵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之后，“慷慨悲歌”成为燕赵之地延续 2000 多年而不改的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赵文化的独立标志和主要特征，古往今来一向受到人们的仰慕。燕赵之地的风俗勇武任侠，形之于诗文，就有了慷慨悲歌的诗风和文风。

燕赵这种文化特质的形成，与燕赵之地所处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首先，燕赵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一区域的古代的生态环境。古代黄河以北的河北平原，洪水横流，草木茂盛，禽兽繁多。这种生态状况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阻碍，给人们带来了有待整治、开辟的艰难逆境，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动力。后来，燕赵地区变得干旱少雨，土地贫薄，天气苦寒。这种生态环境必然要影响到这一区域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心理情感，影响到这一区域的风俗习尚以及文化学术。可以说，没有北方生活环境的艰难苦寒，就没有燕赵人的勇武任侠；没有燕赵人的勇武任侠，也就没有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其次，燕赵地区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擅长骑射，惯见刀兵，剽悍难制，慷慨任侠。正因为如此，燕赵地区的风俗古朴厚重，更近于古。

四

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策源地当属长江流域，在万里长江流经的广大区域，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长江流域水资源丰富，特别是中下游区域河网密布，水在各区域文化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给区域文化打上了深深的水文化的烙印。下面着重就长江上、中、下游文化的代表——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的特色及与水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

巴蜀文化。古巴蜀地区，主要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四川省（即今四川省和重庆市）。殷周时期，今四川地区还不是中原华夏族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而是当时中国境内若干方国中的两个方国。在今川西地区，是以古蜀族为中心建立的蜀国，其疆域以岷江流域为中心；在今川东地区，是以古巴族建立的巴国，其疆域以嘉陵江流域为中心。直到战国末期，这一地区才统一到秦国的版图之中。巴蜀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治水文明的灿烂。

四川盆地坐落在青藏高原的东侧，位于东西两大洋之间（东南距太平洋、西南距印度洋均为 1200 公里左右），而且其间无高山阻隔，两洋的暖湿气流均能到达，故而形成了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积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

熟之广东平原相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任乃强《乡土史地讲义》第二章），这就是古四川之地所以能够成为“天府之国”的若干优越的自然条件。但是，任何优越自然条件都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社会的繁荣，何况四川还有诸多不利的自然条件。比如，雨量较大但降雨的时间分布极不均匀，大多数雨水集中在夏秋两季，容易造成洪水灾害；水量最大的岷江，从岷山奔腾而下，一出山口，猛然转入平原，流速锐减造成泥沙淤积、水流不畅，使川西地区经常遭受水灾。

水患频仍的现实，必然会导致治水活动的活跃。蜀人治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古蜀王杜宇时代，就有关于水灾和治水的记载，而且因“其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华阳国志·蜀志》）有功，杜宇还将王位禅让于他。这件事表明，除水害是当时头等的大事，治水有功者可以被推上王位，这与中原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被推为王的故事颇为相似。而战国末期秦蜀郡李冰领导的治水，是对整个川西平原的全面治理，包括泄洪、灌溉、航运、漂木等几个方面，特别是由他主持兴建的都江堰，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至今仍发挥着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李冰之后，蜀人治水世代不绝，如汉时文翁曾“穿湔江口，灌溉农田千七百顷”；三国时诸葛亮曾视都江堰为“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并派千余人专门维护管理此堰。正是由于长期对水害的治理和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川西平原终于在秦汉时出现了“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左思《蜀都赋》）的景象，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天府之国从此得以造就。

荆楚文化。荆楚地区主要指两湖（湖北、湖南）。楚民族是我国古代南方的一个重要民族，在殷末逐渐定居于长江中游两岸和汉水中下游一带。它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西周时，中原一带的诸侯国把它称之为蛮夷，它和西周王权保持着半独立的关系。自春秋时起，随着楚地富饶的土地资源的不断开发，楚国国势日盛，一跃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和强国。在春秋时的南北角逐中，楚是南方各国之雄；在战国时期的东西对抗中，楚是东方各国之长。相对于中原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南国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楚人热情奔放而又自由舒展，酣歌狂舞而又轻松愉悦，神与物游而又神游物外。浪漫主义既是楚文化的艺术情调，也是楚人的生命放歌。巫术、神话、乐舞、楚辞、哲学等是楚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主要载体，它们体现了楚文化中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楚地的庄子是一位奇特的诗人哲学家，它那贵真全性、潇洒放达的人格追求，辩证开放、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汪洋恣肆、瑰丽谲怪的艺术风格，可谓“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李白《大鹏赋》）。如



果说庄子在古代浪漫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树起了一座丰碑，那么作为楚文学代表的《楚辞》，堪称浪漫主义的巅峰。《楚辞》是战国时代在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一种新诗体，它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以六字句和五字句为基本句式，参差错落，灵活多变。《楚辞》以感情炽热、语言绚烂鲜丽、充满神话幻想为基本特征。“《离骚》、《天问》和整个楚辞……，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李泽厚《美的历程》）这种浪漫主义精神风貌高扬了楚文化进取的主旋律，成了楚文化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风格，濡染浸润和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直到今天仍起着巨大的感召作用。

这种楚文化——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成因，与楚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楚地的自然环境特点是：山水平原杂错分布，江河纵横、湖泽棋布，山野丛林鸟兽出没，风雨晴晦朝夕不同，自然物产繁多富盛，生产方式相对于北方而言亦呈现多样化。这是一片充满浪漫激情的肥沃土壤，人民生活这样一种多样化的和谐优美的大自然的怀抱中，造就了他们情感变化多样、热烈且无拘无束的浪漫气质。清人洪亮吉《春秋时楚国人文最盛论》一文指出：“楚之山川又奇杰伟丽，足以抒发人之性情。”日本学者青木正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中也论述道：“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水明媚，富有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思的悠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幻想，热情，诗意。而文艺思想，则趋于唯美的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荆山楚水，江山如此多娇，就是这一片奇风异俗、巫风谣俗、风土人情，成为楚人浪漫主义的温床。

吴越文化。古代的吴越，主要包括今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春秋时期，都于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吴国与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国之间战争不已，使得具有近亲关系的远古吴文化和越文化进一步融合为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南沿海区域文化。水文化发达，无疑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特征。

吴越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降水丰富，水网密布，长江、淮河、钱塘江等大江大河纵贯其中，太湖等湖泊港湾星罗棋布，这种自然环境为吴越的物质文化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水对吴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重要的意义。其一，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造就了吴越之地发达的水稻文明，构成了吴越人民的生命线。其二，河湖密布的水环境编织了一条交通便利的运输网，既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也造就了吴越发达的船文化。其三，河湖密布的水环境启发了吴越人利用水生动植物养育自己的生存途径，从而构成了先进的渔文化。

五

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中华文化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因此，在中华区域文化的大格局中，不能忽视草原——游牧文化现象。与追求稳定与和平的农耕人形成强烈对照，在 400 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地区，虽然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这里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这种文化以内蒙古草原文化最为典型。应该指出的是，游牧文化虽然以“逐水草而居”为特色，但与农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的纽带将二者结合起来，使游牧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的游牧—草原文化区主要是指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蒙古草原地处欧亚大陆的交汇地带，北与西伯利亚相毗邻，南至阴山山脉与中原农耕文化相接，西起阿尔泰山与羌藏山岳相通，东以大兴安岭为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这就是内蒙古草原的真实写照。内蒙古高原的草原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以牧业为主亦牧亦农的匈奴出现，是北方草原文化圈形成的重要标志。早在秦汉之际，匈奴人便以不可阻挡之势登上了广阔的蒙古草原的大舞台，并缔造出与农耕文明相异的牧业文明。

古人称农耕定居国度为“住国”，称迁徙无定的游牧国度为“行国”。“行国”的特点是“逐水草而居”。所谓“逐水草而居”，不是一种散漫的任牲畜随便游移的自然状态，而是牧人根据水源、草势、地形、季节、气候状况驱赶畜群迁徙。水不但对农耕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对草原民族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水丰则草盛，草盛则牛羊肥壮；与此同时，水丰则人类生活用水方能无虞，不会受到干渴的威胁。相对而言，内蒙古草原的降水量较农耕区要低得多，一般都在 400 毫米以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为农耕人护卫发达农业经济和先进中原文化防线的长城（明长城）线路的走向，几乎与 400 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这恰恰说明，长城是湿润区与干燥区的边界，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边界。

生活在长城以外的草原人的生活方式是：“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食肉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舍，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而居，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汉书·晁错传》）农耕人由定居生活养育出的饮食起居习惯，也无法与“风雨罢（疲）劳，饥渴不困”的游牧人一较短长的。因此，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人常常处于守势，而经济、文化落后但孔武善战的游